

• 体育人文社会学 •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对中国体育话语权的构建

刘仲豪, 邓星华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对 1924—1949 年中国体育话语权构建做出重大历史贡献。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成立, 标志着外国人主持中国体育竞赛的历史结束, 维护中国体育主权。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通过激活体育价值观认同机制、推动体育知识传播以及构建体育规范等方面培育国民体育价值观念, 对挽救民族危亡具有重要历史价值。通过参与国际体育组织、会议及赛事, 获得一定组织任职权、国际事务评议权以及赛事参与权和裁判权等途径, 为中国争取体育国际话语权做出重要贡献, 并向世界表达了中国人的体育精神和民族精神, 同时使中国传统体育开始被世界所认知。

关 键 词: 体育史;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体育话语权; 体育价值观念; 体育利益诉求
中图分类号: G8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1)03-0025-06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ports discourse power from 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

LIU Zhong-hao, DENG Xing-hua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 has made great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ports discourse power from 1924 to 1949.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 marks the end of the history of foreigners hosting China's sports competitions and upholds China's sports sovereignty. Through activating the recognition mechanism of sports values, promot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sports knowledge, and building sports norms, 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 has cultivated national sports values, which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value for saving the national crisis.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sports organizations, conferences and events, gaining certain organizational functions and powers, the right to comment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and judge sports events, those have made som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China's striving for international sports discourse power, and to express the Chinese people's sports spirit and national spirit for th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has begun to go forward to the world.

Key words: sports history; 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 sports discourse power; sports value concepts; sports interests demand

20 世纪 20 年代, 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 在“民族救亡”使命推动下,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于 1924 年在南京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成立对中国体育话语权构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成立过程”和“主要工作”本身上, 很少从

体育话语权构建的视角探讨。话语权的概念由福柯开创, 他提出“话语即权力”的著名命题^[1]。话语权强调的主要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反映本国利益和要求的价值观念主导权^[2]。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对中国体育话语权的构建, 主要是对体育价值观念的培育与引导、

收稿日期: 2020-09-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体育国际话语权提升的机制和路径研究”(19ATY002)。

作者简介: 刘仲豪(1989-),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体育历史与文化、体育原理。E-mail: 929390788@qq.com 通信作者: 邓星华

对中国体育权益的维护以及体育利益诉求的表达。以体育话语权基本内涵为线索,贯穿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主要工作事迹,围绕 1924—1949 年中国体育竞赛权益维护、国民体育价值观念培育和中国体育利益诉求表达等方面展开研究,旨在挖掘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构建中国体育话语权方面的价值。

1 维护中国体育竞赛权益

1.1 收回中国体育竞赛主办权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之前,中国体育竞赛主要控制在外国人手上。“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体育组织和运动竞赛由外国人发起和主办,体育组织实际负责人、竞赛裁判员、运动队教练甚至出国代表队领队都常常是外国人。1922 年以前,中国主要体育组织及体育赛事管理权大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中国体育人才大都处于协助地位^[320]。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之前,中国虽然出现由国人独立自主组织和指导的体育赛事,如华北运动会,但这也只是地区性和临时性的,因此中国仍然尚无全国性固定之体育组织^[4],组织领导中国人自己的体育赛事。

20 世纪 20 年代初,中国教育界和体育界发出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体育比赛主办权的强烈呼声^[5]。1923 年业运联组织中国代表团参加第六届远东运动会(简称“远运会”),相关事宜全权由该会书记格雷(美国人)主持^[630]。结果惨遭失败,国人归罪于业运联办事不当,外人领队多有不便^[7]。在失败教训下,国人开始抵制第三届全运会并筹备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1924 年 1 月业运联开始发起和组办第三届全运会^[8]。但自 3 月起,抵制呼声顿起,首先反对的是武汉的体育团体,表示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已然完全失败,而今“仍令葛雷主持全国运动会,实为放衰责任”;4 月,香港南华体育会否认业运联为中国合法体育总机关^[6]。随后,上海精武体育会表示“取消参会事宜”^[322]。面对如此局面,上海圣约翰大学体育教员兼《申报》体育编辑蒋湘青指出,应成立全国性体育总机关,呼吁“中国之事本应由中国人自办”^[6]。在“中国事由中国人办”思想共识下,于 1924 年 7 月在东南大学举行成立全国性体育总机关大会,有来自 10 余省 66 人参会,各区代表选举张伯苓、沈嗣良等 9 人为临时董事^[6]。随后召开董事会,讨论、修正章程,将总机关定名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协进”二字特表明大家“同心协力,以谋进步”之意。

1.2 掌握中国体育竞赛的组织领导权

体育协进会的成立使中国人开始掌握中国体育竞赛的领导权。1924 年,体育协进会成立首届领导群体,

由王正廷担任名誉会长,张伯苓、穆藕初、卢炜昌等 9 人担任董事,由沈嗣良担任名誉主任干事^[9]。1933 年成立第二届领导群体,由张伯苓、朱家骅等担任正副会长,林珠光、陈时等担任名誉董事,王正廷、马约翰、吴蕴瑞等担任董事,曹云祥、赵锡恩等担任常驻委员^[10]。1935 年成立第三届领导群体,由张伯苓、郝更生等 15 人担任董事,金曾澄、商震等担任名誉董事^[11]。1942 年成立抗战时期领导群体,由张伯苓、董守义等担任常务理事,王正廷、章辑五等 15 人担任理事,张治中、沈鸿烈等担任监事,董守义担任总干事^{[12]768}。体育协进会的领导均来自社会各界闻人名流。此外,还邀请军政界要员担当运动会筹备领导和委员,如邀请宋子文、张学良等担任第九届远东运动会名誉董事;推举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社会部部长谷正纲等担任第十四届世运经费筹募委员会委员^[365]。

体育协进会建立了一套组织管理中国体育竞赛的权力制度。会员代表大会是体育协进会的最高权力机关,由会员选派代表组成。体育协进会成立之初规定“本会会员,以区为单位,暂分华东、华南、华西、华北、华中五区”^{[13]27};1927 年修改章程,将会员单位由“区”改为“城”;1931 年再次决议,改以省、市、特别区及华侨团体为会员单位^[329-30]。初期的董事会和后期的理事会均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和理事会及其下设常驻委员会和常务理事会掌握着本会一切重要职权、管理一切重要事务,如计划会务、筹办经费、组织各项赛事、编纂本会年刊、处罚违规团体或个人等^[331-39]。

1.3 使中国体育竞赛增添国家元素

中国体育竞赛活动的话语主语或目的开始由“体育”转向“国民体育”。自近代以来,“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在中国宣传西方近代体育的是基督教青年会”,但该组织推行体育在于西方体育的繁荣发展,而不是为中国国民更好发展。1922 年基督教青年会操持所谓全国性的运动组织,即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试图掌握中国体育的组织领导权和赛事活动主控权^[14]。然而,比较业运联和体育协进会的章程宗旨,不难看出,业运联宗旨只字未提中国国民,更谈不上将中国国民作为主语或目的来表述宣言,自始至终的主语或目的都是“运动、运动比赛和运动游戏”之类^[14]。反观体育协进会,各个时期章程宗旨,首要的主语或目的都在于“国民体育”。因此,体育协进会成立之后,中国体育竞赛活动的话语开始以“中国国民体育”为基点进行构建,推动中国体育竞赛权益回归国民。

体育竞赛的文化礼仪开始具备中国风格。体育协进会成立之后系统、有规划地翻译、审定各项运动规

则,改变以往运动会采用英文版运动规则和术语的局面^{[3]95}。而改以中文呈现,裁判也渐以国人为主体^[5]。体育比赛场馆开始由单纯模仿欧美式建筑风格,转变为民族复兴意志下新民族体魄的空间表征,如1933年的南京中央体育场,更多从传统牌楼及细部装饰中汲取灵感,1935年的上海江湾体育场,其体育馆入口引入古代城楼构件作为装饰符号^[16]。体育协进会的领导积极开发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体育运动,如1939年干事魏振武等3人在苗族传统拍击“鸡毛羽”运动基础上,改进球、球拍和场地,发明“板羽球”运动^{[3]125}。

2 培育与引导国民体育价值观念

2.1 激活国民体育价值观念的认同机制

推动国民体育价值观念内化。任何思想形成都是受利益驱动和价值参与,只有符合自己利益的外界信息和刺激才能被认可和接收^[17]。体育协进会所处时代,中国人民最大利益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在民族危机历史语境中,民族主义压倒性成为体育协进会体育观念的思想内核^{[5]78}。其一,强身健体以救国的体育价值观念。张伯苓认为“国人多孱弱,若人人习于运动,可跻健强”,呼吁“注重体育,锻炼健强之国民”^[18]。王正廷^[19]指出“体育者,个人之生命也,亦民族之生命也”,故“今欲救国必先强种,既欲强种,非男女体育同时提倡,不克奏效”。其二,改善民族精神以救国的体育价值观念。面对“人人好逸恶劳,终日沉溺于酒色烟毒之中”的国家萎靡样态,王正廷^[20]认为“惟运动一项,足以替代此种不良之游戏及行为”“此为救亡之要道也”。郝更生^[21]指出“体育教育有关国家元气及民族精神者极大”,“若不早日体育救国,不但要亡国,更有灭种之虞”。其三,艰苦奋斗和团结协作以救国的体育价值观念。张伯苓指出“国内纷扰不已,外侮迭来,推其原因,不外国人私心太大,毫无团结力量”;而体育既能“养成坚韧耐酷之心”,又能培养“合作之精神”^{[3]75}。其四,培养国家意识以救国的体育价值观念。王正廷指出“体育足以激励国家观念,尤为立国之要策”^{[3]76}。因此,体育协进会的体育价值观念契合了中国人核心利益与价值诉求,有助于推动国民体育价值观念内化。

增进国民体育价值观念的实践强化。其一,在全国各地成立体育组织。1937年前,体育协进会在全国先后成立29个分支会^{[3]80-83}。抗战爆发后,仍奔走各地指导组建分支,截至1943年,分支有“重庆、兰州、西安等十四所”,且“各地分支会,由最大的都会以至很小的县镇,正在不断增加”^{[22]34-35}。其二,推动体育场地器材生产建设。1925年经多方筹措,体育协进会

组建了“中华运动场”,作为“国人提倡体育之大本营”。1935年在王正廷、沈嗣良参与主持下,上海市建成江湾体育场,由田径场、体育馆及游泳池所组成,可容纳6万余观众,是当时国内最大体育场。1920年前,中国体育器材基本靠进口,十分昂贵。1924年傅泊川等人创办“春和体育用品厂”,该厂从创办、生产到销售都获得张伯苓鼎力支持^[23]。此外,作为体育协进会元老的张伯苓对天津最早制造体育用品的“利生体育用品工厂”进行多方扶持,使其稳步发展^{[3]114-115}。其三,开展多样化体育赛事。通过主办、协办或参与方式开展不同级别、类型的体育赛事。将全国分为华东、华北、华中、华南等运动区,定期举行运动会;并推动各省运动会开展,协助“辽宁、江苏、湖北、广东等省运动会凡十一次”^{[3]116-118}。因此体育协进会扩大了国民参与体育锻炼和比赛的机会,使得体育运动进入国民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从而在实践层面上强化国民的体育价值观念。

2.2 传播体育知识以提高国民体育认知和兴趣

利用报刊、著作、电影传播体育知识。其一,体育报刊。主要介绍体育赛事、公布运动规则、提倡发展国民体育等。如《申报》和《大公报》对第十、十一、十四届世界运动会的报道总计分别达300、987和536篇^[24]。登报刊载过《男女篮球运动规则更改》《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业余运动规则订定》等^{[3]99-102}。发行3种会刊,即《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年刊》《体育季刊》和《体育通讯》。其二,体育著作。组织编译、撰写了一系列体育著作,如宋君复的《体育原理》《女子垒球训练法》,吴蕴瑞的《体育建筑及设备》《运动学》,董守义的《国际奥林匹克》《篮球术》,程登科的《军事体育》《世界体育史纲要》等^[25]。其三,体育电影。第十一届世运会后,体育协进会获赠体育影片,是关于此届世运会开幕典礼、各项建筑设备及运动竞赛情形,其中含有“十二大项表演”;为扩大宣传,购置了放映机一架,在各地巡回放映该影片^{[3]58}。因此,体育协进会向大众传播运动项目、比赛、规则、国内外体育信息以及体育学术理论等知识,提高国民体育认知和兴趣,为体育价值观念的培育奠定知识基础。

利用演讲、培训、表演等传播体育知识。其一,体育演讲及培训。1936年沈嗣良应上海青年会之邀,做关于“吾国参加世运会的经过”的演讲,传播了奥运会等体育知识^[26]。1942—1943年开办垒球班、机巧班和国术班,培训人数分别达502、1500和1269人^{[22]42-43}。其二,体育巡回表演。1943年重庆分会组织“民族健康运动体育表演”,前后达一个月之久,观众达14万人之多,表演项目有团体操、足球等十余种^{[22]47}。

其三, 体育讲习会与讨论会。鉴于“欲求全国体育普及, 尤应广造师资指导民众”, 沈嗣良等决定 1935 年举办暑期讲习会, “供给中等以上学校体育教员、民众体育指导等进修机会”, 招收 200 名学员, 涵盖“各省市市区及南洋侨胞”, “堪称普遍之至”^[36]。经整理形成《讨论会论文及讨论撮要》, 供全国体育界之参考^[27]。因此, 体育协进会有针对性的进行体育知识传播, 提高了特定人群的体育认知和兴趣。

2.3 构建体育竞赛规范以保障国民体育价值观念的确立

制定运动竞赛规则。体育协进会成立运动规则委员会, 负责编订、审定、颁布运动规则等工作。1925 年董事会推举宋如海、蒋湘青等 6 人担任运动规则委员会委员, 规定“各项运动规则之编译, 盖由干事负责。完成草稿, 送呈各委员校阅, 然后出版”^[28]。抗战全面爆发之初, 运动规则委员会工作几陷停顿, 直至 1941 年才重新成立, 聘请袁敦礼、宋君复等 7 人为委员^[22]。体育协进会编译了众多运动规则。1927 年编译《全能田径赛运动规则》《游泳规则》等。1935 年联合全运会共同编译了《男子篮球规则》《网球规则》等^[396]。截至 1937 年, “先后审定业余运动及各项运动规则十四种”^{[12]765}。1941 年体育协进会计划译订最新规则, 如最新业余运动规则、最新足球规则等, 并组织审查发行^{[12]756-757}。编订、审定的运动规则主要通过图书、报刊、会刊等媒介向社会公布。运动竞赛规则的制定树立了体育竞赛规范性, 有助于引导国民体育价值观念的形成。

确立业余运动原则。成立运动员资格审查委员会和业余运动规则委员会, 负责相关修订和审查工作。1924 年体育协进会成立时即提出设立“运动员资格审查委员会”^{[13]29-30}。1936 年董事会决定聘请张伯苓、郝更生等为修正业余运动规则委员会委员; 1941 年迁渝后, 重新聘请程登科、徐英超等 5 人为运动员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31]00}。早在 1924 年章程中就规定 8 条业余原则条例, 如“凡以金钱为比赛之目的者、假借他人姓名加入比赛意图蒙混者等, 不得参加本会主管之一切运动比赛”^{[13]30}。1930 年体育协进会将业余运动定义为“为娱乐、为体格上、道德上及智力上之训练而参加比赛”^[29]。1931 年规定业余运动的宗旨为, “某项运动之职业运动员或明知故犯而已成为职业运动员者, 不得参加该项或任何一项运动; 业余运动员不得因参加运动比赛损失其薪水, 而收受金钱之贴补或酬报”^[30]。此后国内所有运动会, 莫不奉行此规则, 以为运动员参加比赛的标准。执行方面, 体育协进会表现出管理的权威性和坚韧性。1927 年第八届远运会华

东预选赛期间, 体育协进会查出黄胜白为学校体育教职, 不属于业余运动员, 便取消了其参赛资格^[31]。因此体育协进会通过一系列坚守业余运动原则的努力, 确保体育竞赛的公平公正性, 有助于保障国民体育价值观念的确立。

3 对外表达中国体育利益诉求

3.1 参与国际体育事务以争取相应话语权

1) 参加国际体育组织和会议。体育协进会作为中国的代表, 参加远东体育协会、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国际单项体育组织, 参与国际休闲及娱乐讨论会、国际运动学员营等。1927 年体育协进会名誉会长王正廷当选为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会长^[32]。1931 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体育协进会为国际奥委会团体会员和中国的国家奥委会。体育协进会成立之前中国只有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 即王正廷委员。此后经体育协进会的努力, 孔祥熙和董守义分别于 1939 和 1947 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31]38}。1932 年美国发起国际休闲及娱乐讨论会, 邀请世界体育专家参加, 沈嗣良出席会议, 报告了我国体育近况^[33]。1936 年德国举办第二届讨论会, 有 40 余国家, 约 5 000 人参加, 郝更生应邀作“我国休闲娱乐情形”的报告。同时, 中国体育考察团参加了德国举办的国际运动学员营, 安排丰富多彩的活动, 展示各国独特的体育文化活动^[34]。因此体育协进会积极参与国际体育组织与会议, 获得一定国际组织任职权和国际体育事务评议权。

2) 主办及参与国际体育赛事。远东运动会和世界运动会(现称“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体育协进会主要参与的国际性体育赛事。体育协进会主办了第八届远运会, 主持参加了第七、九、十届远运会。主要参赛项目有田径、足球、篮球等, 其中足球连续 4 届获得锦标^[35]。主持参加了第十、十一、十四届世运会, 主要进行了田径、足球、游泳等项目的角逐, 遗憾的是在这 3 届世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均未进入决赛。另外, 中国代表还参与国际运动竞赛的裁判执裁。第十一届世运会篮球决赛在美国队和加拿大队之间进行, 担任这场决赛的裁判员(当时规则只有 1 位裁判)是中国人舒鸿, 舒鸿成为中国体育史上首位为奥运会篮球决赛进行执裁的裁判^{[36]158}。因此体育协进会积极参与国际性体育赛事, 使中国获得一定的赛事参与权和裁判权。

3.2 对外表达中华体育精神

1) 展现体育精神。其一, 表达重在参与的体育精神。王正廷公开表示, “我们来参加远运会, 最大目的不是在乎夺锦标, 而在乘此机会促进体育运动。”^[37]沈嗣良指出, “我们只要参加、只求同世界各国联合共

进,而不求银杯银盾为意的愿望”。^{[31]72}其二,展现友谊与和平的体育精神。第七届远运会上,中国选手遭受不公判罚,欲罢赛退场。沈嗣良立即劝说:“参加远东运动会,是为联络邦交及遵守运动规则,胜负不足为荣。”中国选手最终回场再赛^[38]。王正廷表达体育促进世界和平的伟大理想,指出:“奥林匹克运动乃促进国际邦交感情之最好机会。愿以体育之精神,运动之道德,彼此协力解除国际之难局,促进世界之和平运动。”^[39]其三,展示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第十届世运会,刘长春虽未获得理想名次,但其奋斗精神却广受称赞,时人认为“最切要者为我国之运动精神,将因刘君而有一新世界之认识焉”^[39]。第十一届世运会,吴蕴瑞^[40]指出:“我国此次参加结果,虽然田径一分未得,可是足球和英国比赛,上半节能保持平手,引起世界极大之注意,可说虽败犹荣。”

2)宣扬民族精神。体育协进会在发扬中华民族精神方面主要体现为对爱国精神的宣扬。郝更生认为第十届世运会,刘长春等人的使命也在于“打破日人之伪国无稽宣传”,希望刘长春、宋君复将九一八事变中“耳闻目睹之暴行,公告于全世界”。刘长春亦明言,此行为“争国家之地位,揭奸人之阴谋”,可见他参赛主要是为粉碎日本“以伪国作宣传,使世界各国易于承认伪国”的阴谋^{[31]73}。体育协进会坚决反对伪“满洲国”加入远东运动会。王正廷公然表示,伪组织参加远东运动会决无道理,倘日本强其加入,我决退出,以示抗议^[41];郝更生亦强烈谴责日本破坏远东运动会的行为,并郑重声明:“今天,很不幸的眼见政治阴谋渗透于此一神圣庄严组织之中,我唯有正式宣告退出此一沾染污点的组织。”^[42]1938年我国代表“向世运执委会申诉我国立场,一致反对下届世运会在东京举行”,此提议虽未获通过,但亦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破坏和平的暴力行径,“深得欧美各执委之同情”^[43]。因此,体育协进会通过申诉、抗议不法竞赛行为的方式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向世界表达中华民族爱国精神。

3.3 宣扬中国传统体育运动

1)通过体育媒介宣扬中国传统体育运动。其一,拍摄体育电影。为参加国际体育影片赛,体育协进会拍摄了一部“德语有声运动影片”——《中国体育》。该影片主要介绍中国传统体育运动,有“太极拳、踢毽子、射箭等,以及其他各项运动之表演,颇为精彩”^[44]。为宣传中国传统体育,《中国体育》留存中国驻德大使馆放映^[45]。其二,赠送体育书刊。第十一届世运会期间,中华国术队向外宾赠送《太极操》《中国拳术之概要》等刊物,“各国人士前来索取刊物者,日不暇给”,体育协进会将《太极操》刊物留存大使馆,转赠各国

图书馆,以便外国人了解、学习中国传统体育^[45]。

2)通过现场展演宣扬中国传统体育运动。体育协进会趁参加第十一届柏林世运会之机,派遣国术选手,参加世运会表演,“藉以宣示吾国固有武术之真价值”^[46]。世运会上,中国武术的表演,向世界体坛充分展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风采,为中华武术走向世界迈出第一步^{[36]158}。中国国术队到达柏林后,即奔赴汉堡参加国际体育艺术表演活动,“博得数万观众之欢迎”。之后在有许多德国政界要人参加的柏林华侨学生欢迎会上,表演国术、太极操及太极球,“次日各报登载消息,颇多赞誉之词”^[45]。1936年8月11日中华国术队正式表演,展示了团体太极操、单拳、对拳、器械等,“均极精彩,博得数万观众之欣赏。鼓掌欢呼之声,历时颇久”^[45]。

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体育竞赛的组织领导权把控在外国人手上,体育竞赛的文化礼仪自然移植于国外。面对此种样态,“民族救亡”的使命感催生出“收回体育主权”运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由此诞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通过推进国民体育价值观念的主观内化和实践强化,以激活国民体育价值观的认同机制;通过推动体育知识的大众传播和群体传播,以提高国民体育认知与兴趣;通过制定运动竞赛规则和业余运动原则,以保障国民体育价值观念的培育。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通过参与国际体育组织、会议及赛事,获得一定任职权、评议权以及赛事参与权和裁判权。同时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中国人的体育精神和民族精神,中国传统体育运动也开始走向世界。反思1924—1949年间的中国体育话语权历史状况,虽然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做出巨大努力,但依然没能摆脱对西方文化话语权的依赖性,这是当时中国体育的历史境况决定的。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体育话语权的构建不仅需要谨慎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力,更需要构建起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 [1] 张志洲. 话语质量: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J]. 红旗文稿, 2010(14): 22-24.
- [2] 王晓升. “意识形态”概念辨析[J]. 哲学动态, 2010(3): 5-12.
- [3] 陈明辉.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与近代社会体育事业(1924—1949)[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2017.
- [4] 谷世权. 中国体育史[M].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1997: 238.
- [5] 吕玉军,伯亮. 民国时期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J].

- 历史档案, 2001(4): 105-108+113.
- [6] 张天白.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筹备成立始末[J]. 体育文史, 1990(6): 30-34.
- [7] 吴文忠. 中国体育发展史[M]. 台北: 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1981: 94.
- [8] 卢勇. 旧中国第三次全国运动会纪略[J]. 湖北文史资料, 2001(1): 42-50.
- [9]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职员录[J].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年刊, 1927(1): 2.
- [10] 本会职员一览[J]. 体育季刊, 1935, 1(1): 131.
- [11] 第三任董事第一次会议记录(1935年10月19日)[J]. 体育季刊, 1936, 2(1): 113-114.
- [1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 第2编[M].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98.
- [13] 王增明. 近代中国体育法规[Z]. 石家庄: 中国体育史学会河北分会, 1988.
- [14] 谷世权. “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成立前后[J]. 体育文史, 1991(2): 39-41.
- [15] 刘剑. 20世纪20年代我国体育话语权诉求的历史回顾[J]. 体育学刊, 2010, 17(7): 23-26.
- [16] 张天洁, 李泽. 20世纪上半期全国运动会场馆述略[J]. 建筑学报, 2008(7): 96-101.
- [17] 冯留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路径探析[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2): 13-18.
- [18] 梁吉生. 张伯苓的办学理念[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32.
- [19] 王正廷. 观第二次远东运动会之感言[J]. 进步, 1915, 8(3): 14.
- [20] 王正廷. 体育救国[J]. 时事月报, 1933, 9(4): 222.
- [21] 郝更生. 辛酸话留美——我学体育的经过[J]. 传记文学, 1967, 12(4): 28-30.
- [22] 重庆市体育运动委员会, 重庆市志总编室. 抗战时期陪都体育史料[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 [23] 孙海麟. 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205-206.
- [24] 郭佳. 民国期间《申报》和《大公报》三届奥运会新闻报道研究[D].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 2008: 17-50.
- [25] 陈明辉, 刘宗灵.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与近代体育知识的传播(1924—1949)[J]. 近代史学刊, 2018(2): 208-232+305.
- [26] 沈嗣良昨在青年会演讲吾国参加世运的经过[N]. 申报, 1936-09-17(15).
- [27] 赵庶常.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暑期训练、讲习、讨论会专号[C]. 青岛: 青岛体育协进会, 1935: 3.
- [28]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临时董事会开会(1925年8月12日)[J].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年刊, 1927(1): 7.
- [29] 远东运动会议决之业余运动规则及秩序[N]. 申报, 1930-07-06(10).
- [30]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业余运动规则订定[N]. 申报, 1931-06-10(10).
- [31] 远东运动会运动员之资格问题[N]. 申报, 1927-06-25(11).
- [32] 阮蔚村. 远东运动会历史与成绩[M]. 上海: 勤奋书局, 1933: 12.
- [33] 在洛杉矶世界体育会议上沈嗣良报告中国状况[N]. 申报, 1932-08-23(11).
- [34] 第十一届世界运动大会筹备会. 参加国际运动学员大会集须知[J]. 体育季刊, 1936, 2(2): 292-298.
- [35] 柯火炎.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研究(1924—1949)[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09: 57-62.
- [36] 崔乐泉. 中国奥林匹克运动通史[M].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8.
- [37] 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专号(下册)[J]. 勤奋体育月报, 1934, 1(9): 21-22.
- [38] 赴第七届远东运动会之经过及成绩纪详[J].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年刊, 1927(1): 82.
- [39] 蒋槐青. 世界运动会史略(一)[J]. 勤奋体育月报, 1936, 3(5): 425-449.
- [40] 吴蕴瑞. 世运会与我国国民体育[J]. 江苏学生, 1936, 8(1): 134-135.
- [41] 伪组织参加远东运动会表演绝望[N]. 申报, 1934-04-11(15).
- [42] 郝更生. 从九一八说到亚运会[J]. 传记文学, 1967, 10(4): 13-17.
- [43] 下届世运仍决定在东京举行[N]. 申报, 1938-04-19(2).
- [44] 中国体育影片参加国际运动影片比赛会九月在柏林举行[N]. 申报, 1935-08-16(15).
- [45] 我参加世运国术表演荣誉[N]. 申报, 1936-09-10(15).
- [46] 参加世运举重代表及国术表演队预选经过[J]. 体育季刊, 1936, 2(2): 332.